



《三国志演义》官渡之战叙述探索

陈曦

摘要:《三国志演义》使刘备集团赫然成为官渡之战叙述的一大重心,不仅将刘备虚构为官渡之战发端阶段的关键人物,把历史上袁、曹对决中的袁氏一方,置换为袁、刘联军,还将刘、关、张由兵败离散到聚义重逢,设置为官渡决战前的情节主线。小说让关羽跳出了官渡之战的历史缝隙,不遗余力地揄扬其忠义情操,但其行为实已颠覆了封建社会的忠信纲常。在实现江湖艺人通俗作品史书化的过程中,小说苦心编织,弥缝补漏,呈现出了一种史官文化与民间文化纵横交织的复杂景观。

关键词:《三国志演义》;官渡之战;叙述;史官文化;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02(2011)01-0024-06

历史并非不可假设。如果官渡之战不是曹操大胜而是相反,那么中国历史又该是如何一种走向?张大可先生推测道:“设若这次战役袁胜曹败,袁绍完全有能力席卷江南而君临天下,那么三国鼎立也就不会出现。”^①由此表述,不但能了解官渡之战对于三国历史的重大意义,也能读出史家对袁绍失败的深沉惋惜。在汉末群雄纷争中,曹操固然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但袁绍也绝非庸人,“不失为一个杰出的人物”^②。就群英荟萃、争斗曲折的精彩程度而言,官渡之战毫不逊色于赤壁之战,若由笔者的构想出发而铺陈敷演,则叙述的重心毫无疑问在于两大集团的斗智斗勇;战役的两大主角——袁绍与曹操,理应成为艺术创造的重中之重。然而《三国志演义》中的官渡之战,却与笔者的阅读期待颇有距离。袁、曹及其较量,竟然在该书追慕史官文化的叙述中,并未成为真正出彩之所在。若推究其中的叙述纹理,一种混杂了史官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喧闹景观,便可逐渐清晰,惹人驻足。

一

合称“三大战役”的官渡、赤壁与夷陵之战,在120回的《三国志演义》中,据统计有28个回目,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③小说中的官渡之战,始于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终于第三十三回的袁氏集团的灰飞烟灭,共有12回的叙述篇幅,其内容采自《三国志》(包括裴注)、《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等。美国学者浦安迪指出《三国志演义》以十回左右为一个结构单元,每一个结构单元围绕着一个人物展开,并指出小说的前两个十回是董卓传与吕布传,而“第三个十回是曹操传,有许田打围、

煮酒论英雄、土山降关羽等酣畅淋漓的笔墨,最后以第三十一回大破袁绍而结束。”^④浦安迪所说的第三个十回,基本属于小说中的官渡之战部分。他认为该部分的中心人物是曹操,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仅从一些回目的名称,如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第二十八回“会古城主臣聚义”,第二十九回“碧眼儿坐领江东”等,可知小说的叙述焦点并非一直垂青曹操,刘备与孙权集团也分别占据了不少篇幅。不仅如此,刘备集团还赫然成为小说官渡之战部分叙述的一大重心,更使“第三个十回是曹操传”的说法难以成立。与袁、曹相比,势力微薄的刘备集团,又是如何成为小说这一部分叙述的一大重心呢?

首先,小说将刘备虚构为官渡之战发端阶段的关键人物,把历史上袁、曹对决中的袁氏一方,置换为袁、刘联军。

小说写官渡决战是在第三十、三十一两回,而大战的发端则是在第二十二回,刘备成为推动袁、曹一决雌雄的重要动因。依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等史料,刘备叛离曹操,攻杀了徐州刺史车胄,之后担心曹操征讨报复,于是决定转投袁绍。袁绍能否接纳刘备呢?小说虚构了刘备与大儒郑玄的一段师生情谊,所谓“玄德在涿郡时,已曾师事之。及为徐州牧,时时造庐请教,敬礼特甚。当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陈登亲至郑玄家中,求其作书。玄慨然依允,写书一封,付与玄德。玄德便差孙乾星夜赍往袁绍处投递”^⑤。郑玄成了刘备投靠袁绍的牵线者,而袁绍又岂能驳了这位大学者的面子?顺着这一虚拟出来的因果链条,袁绍不仅碍于“郑尚书之命”而考虑“不得不往救之”,甚至还将此救援视为兴兵讨曹的契机。他召集文武官员商讨“起兵是乎?不起兵是乎”,谋士沮授反对,认为征伐曹操之举,是“兴无名之兵,窃以为明公不取。”



谋士郭图却不以为然道：

“非也，兵加曹操，岂曰无名？公正当及时早定大业，愿从郑尚书之言，与刘备共仗大义，剿灭曹贼，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实为幸甚。”

袁绍最终决定出兵，并展开了如下军事部署：

先令孙乾回报郑玄，并约玄德准备接应，一面令审配、逢纪为统军，田丰、荀谏、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为将军，起马军十五万，步兵十五万，共精兵三十万，向黎阳进发。

以上两段引文有两句容易被一般读者忽略的文字，即“与刘备共仗大义”、“约玄德准备接应”。在小说关乎官渡之战的整个情节链条中，这两句可谓极其关键。于是，原本打算投靠袁绍的刘备，不但成为袁绍下决心剿灭曹操的推动者，还摇身一变成为袁绍的盟友，使即将展开的袁、曹对决，变成了袁、刘联军与曹操的对决。

美化刘备形象，夸大刘备实力，实乃《三国志演义》常见的叙述逻辑。实际上，迟至建安十四年（209年），49岁的刘备趁刘琦病死，当上了觊觎已久的荆州牧一职，从此才算“真正开始并加快了谋创大业的实际行动。”^⑥此前的二十余年，他仅为一个势单力薄的小军阀，因接连不断的战败而不得不投奔一个又一个的山头，依附刘表时曾悲叹“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三国志》裴注引《九州春秋》），为自己年近半百仍一事无成而“慨然流涕”。然而《三国志演义》却常常刻意夸大刘备在汉末军阀中的地位，比如赤壁大战前，孙权曾明确向周瑜指出曹操最忌惮的军阀是“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认为“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吾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刘备并未进入孙权所列的这份豪雄名单。《三国志演义》却在这份名单的后面加上了刘备的名字，让无足轻重的刘备变成了制衡与抗击曹操的重要力量。小说改写成：“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豫州与孤耳。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计决矣。”极力夸大刘备的力量，抬高刘备的地位，这种远离史实的写法，与把刘备写成袁、曹对决的推动者与盟友一样，均显示了小说对民间叙述“拥刘反曹”宗旨的大力贯彻。

其次，小说详写袁、刘联军中的刘备一方，将刘、关、张由兵败离散到聚义重逢，设置为官渡决战前的情节主线。

在小说的第二十二回，袁绍既已揭开了大战的序幕，部署大军向曹军方向进发，接下来小说自然要写曹操一方是怎样接招的。小说先是用简笔叙写了孔融与荀彧各自对袁绍实力的论述，曹操赞赏主战的荀彧，对战胜袁绍充满信心，并进而作了如下战略部署：

遂唤前军刘岱、后军王忠引兵五万，打着丞相旗号，去徐州攻刘备。……操却自引大军二十万，进黎阳据袁绍。

按诸史书，曹操这两项军事举措实则并未同步进行。曹操是在建安四年（199年）的秋八月“进军黎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而他因刘备击杀车胄而派遣刘岱、王忠前往征伐，则是在建安五年（200年）的正月，小说却改写了曹操这两项部署实施的时间，以显示曹操在官渡之战的发起阶段，便格外重视袁、刘联军中的刘备一方，将其一并纳入战略打击的视野，且在兵力调配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对付刘备，其次才是袁绍，以说明他对刘备势力的不敢小觑。接着，小说又用寥寥几笔交待了袁、曹对峙的态势：

……两军隔八十里，各自深沟高垒，相持不战，自八月守十月。……袁绍心怀疑虑，不思进兵。……曹仁总督大军，屯于官渡。操自引一军，竟回许都。

写两军并无作战意图，淡化了袁、曹对峙阶段应有的暗潮汹涌般的紧张刺激。小说这样写的用意被毛宗岗的夹评一语道破：

按住袁绍一边，以下独叙刘备一边。

果然，小说接下来叙述的重点便转入刘备集团，进入第二十二回下半段的叙述重心——“关张共擒王刘二将”，写刘备的小胜。第二十四回下半段的“皇叔败走投袁绍”，写刘备遭遇大挫，刘、关、张败逃离散。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整整4个回目，围绕着关羽，写他与刘备、张飞从兵败离散到“古城聚义”的过程。其间的笔墨虽然触及袁、曹的白马一役，描述了“袁本初败兵折将”，但小说的重点却不在袁、曹的任何一方，而在刘备阵营中的关羽。《三国志·关羽传》仅用寥寥数语记述关羽降曹后斩杀颜良，随即便“奔先主于袁军”，以至一般的军事史家在谈及官渡之战时，关羽要么被忽略，要么被几笔带过，^⑦形象绝不炫目，但小说却让他跳出了官渡之战的历史缝隙，浓墨重彩地彰显了他的忠义情操，虚构了他如何降汉不降曹，如何斩杀



颜良、文丑二将,如何“来得明白,去得明白”,如何千里走单骑,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如何“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可以说,在《三国志演义》涉及官渡之战的12个回目中,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写关羽,而恰恰正是这些章节,较之其他回目更为千百年来广大读者所耳熟能详、传诵不绝。

有学者指出《三国志平话》对官渡、赤壁、夷陵“这三次战役的叙述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并据此推断该书对罗贯中的创作“并不能提供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⑧这种论点未能正视这一事实,即《三国志演义》继承了以《三国志平话》为代表的宋元江湖艺人“说三分”时的叙述趣味,也将刘备集团人物如何由社会底层而发迹变泰,最终跃为帝王将相的过程,设置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导向。《三国志演义》基本沿用了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所提供的时间顺序编织小说情节,但若从小说的情节主轴与叙述结构来看,它却延续了《三国志平话》等偏重刘备集团的叙述策略,而这正是关羽之所以能在小说的官渡之战部分喧宾夺主、大放异彩的原因所在。

二

在“官渡之战”所限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三国志平话》是依次顺着如下标题展开叙述的,即:“曹操勘吉平”、“赵云见玄德”、“关公刺颜良”、“曹公赐云长袍”、“云长千里独行”、“关公斩蔡阳”、“古城聚义”。仅此便知刘备集团在《三国志平话》故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可知《三国志演义》对前者内容的充分吸纳。当然,对于袁、曹两大集团的抗衡,及其所导致的袁绍势力的灰飞烟灭,《三国志平话》的叙述非但的确“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忽略,并未将其作为作品情节链条中的一环。作为官渡之战主角之一的袁绍,已完全被民间叙述推挤到舞台的边缘,全然不见其曾经身为诸侯盟主的历史作为;另外一大主角的曹操,也无任何笔墨写其如何与袁绍较量。袁、曹对抗已经变成一种远远的背景音乐,若有若无地飘浮于刘、关、张离散聚合的舞台上。观众聚精会神于刘备集团起伏跌宕的命运,有谁会记得那段若有若无的音乐?

与《三国志平话》不同,《三国志演义》却试图让观众记住官渡大战的急管繁弦。任何一位史家探究汉末三国的历史演变,均不敢忽略对这场大战的评述。试图超越民间说书艺人的罗贯中,是以效法史家“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的姿态亮相的,明人蒋大器揭示道:“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

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乎于史。……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因此,对于这场极大影响了汉末历史走向的官渡之战,追慕史家之笔的罗贯中自然不敢怠慢。他需要下一番功夫,不但要演绎这场战役的整个过程,还要在演绎时考虑怎样将《三国志》、《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官叙述与《三国志平话》为代表的民间叙述,有机地嫁接在一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罗贯中还有自己的士人文化立场,于是他的文学叙述实则杂糅了史官文化、民间文化、士文化等不同文化色彩。罗贯中试图将上述不同色彩在小说的画布上有条有理地涂抹开来,殊不知有些色彩是难以搭配与融合的,于是乎便出现了诸多的冲突,暴露了诸多的破绽。

在小说的“官渡之战”部分,冲突主要发生于史官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多为官修,故而史官文化往往体现了封建官方意识,宣扬忠孝节义,抨击乱臣贼子,鼓吹正统观念与君臣大义;而民间文化多宣扬江湖义气、兄弟之情,讴歌生死之交与帮派盟誓。这两种文化的内核并不相融,一旦君臣大义与兄弟之情发生碰撞,史官文化恪守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君权至上;而民间文化讴歌的却是兄弟情谊高于一切,揄扬同生共死。这一本质分歧形象地体现于关羽的如下行为:

曹操进攻徐州,刘备兵败只身投奔袁绍,张飞逃往碓硌山,而关羽则被曹军围于下邳城外的一个土山的山头。曹操派张辽劝降,关羽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即所谓的“三事”:

“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五回)

毛宗岗在夹评中指出关羽所提“三事”,一“辨君臣之分”,二“严男女别”,三“明兄弟之义”。依据他的点评,关羽似将君臣纲常与兄弟情谊融为一体,毫无缝隙,然而接下来小说叙述的关羽行为却很快破坏了这一和谐与完美。小说写袁绍大军逼至黎阳,曹操商议迎战。关羽闻知这一战情,便主动请缨,“愿为前部”;到了前线,不惧袁绍上将颜良的威名,向曹操承诺道:“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他果然英勇异常,武艺超群,“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



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顶之下，飞身上马，如入无人之境。”关羽凭此万夫不挡之勇，被曹操赞叹为“真神人也。”刺杀颜良这一幕，成为小说展示关羽神威的典型事例。

该如何分析关羽的这一行为？显然，人们不应仅看到“颜良是袁绍上将，而其时刘备是袁绍之客”，并立足于此揭示“其中的讽刺意味。”^⑨若进一步联系官渡之战袁、曹对抗的背景，那么关羽作为袁绍盟友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他的斩杀颜良纯属投敌卖友，背弃盟约。况且当初袁、刘合力进攻曹操，向外打出的旗号是“共仗大义”。这里所谓“大义”，借用袁绍谋士田丰的话，就是“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五回）。捍卫汉献帝的统治，是他们军事行动的最高纲领。之前刘备还曾接受汉献帝讨伐曹操的密诏，因而在战场上与曹操正面交锋时，他义正词严地宣称：“吾乃汉室宗亲，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三国志演义》第三十一回）。既然刘备集团口口声声尊奉汉献帝为君，况且关羽投降曹操时也声称“只降汉帝”，那么他的斩杀颜良，岂不是背叛汉帝、助纣为虐吗？这与他表白的“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云云，岂不是自相矛盾？

降汉不降曹，仅是关羽为自己投降曹操寻找的一个道德台阶；踩过这个台阶之后，他何尝真正想过切实地捍卫可怜的汉献帝的皇位？进入曹营之后，他一心考虑的是如何以军功报答曹操的厚待，之后迅速脱离曹营与刘备会合。谁是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君”？显然，绝不是汉献帝，而是他的结拜大哥刘备。关羽有一段显豁的表白：

（张）辽曰：“公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如何？”公曰：“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岂可共论乎！”（《三国志演义》第二十六回）

关羽明确指出他与刘备是一种朋友加兄弟加君臣的关系。在给刘备的一封信中，他发誓如若自己背叛这种关系，则将“神人共戮”（同上）。而对汉献帝，他何曾表达过这种誓死效忠的真挚情怀？何曾在离开曹营时流露过对汉献帝的怀恋？因此，在他心中，真正的“君”是他的大哥刘备。他誓死捍卫的是民间文化所揄扬的帮派情谊，并让这种江湖之“义”不仅凌驾于盟军之间的信义之上，更凌驾于史官文化所倡导的君臣大“义”之上。钱玄同先生曾指出这部小说的作者“费尽心力”地刻画诸葛亮的贤相形象，结果却弄巧成拙

地把他写成“一个阴险诈伪的人”^⑩；鲁迅先生则指出小说原想把刘备塑造成仁义之君，结果却适得其反地“欲状刘备之长厚而似伪”。^⑪同样，在塑造关羽形象时，小说对其忠义情操的揄扬似已无以复加，但他的不少行为实则经不起推敲，已然颠覆了封建社会的忠信纲常。或许，这是作者杂糅史官文化与民间文化时所始料未及的。

三

《三国志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这大概而言的虚实比例，说明它完全不同于《西游记》之类“无中生有，任意起灭”的小说，而是充分尊重并大量采用了汉末三国的史料，故而毛宗岗感叹《三国志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不易写好，因为它无法做到信马由缰，任意驰骋，而须“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读三国志法》）。如何做到两全其美，既“依史以演义”（伪金圣叹《三国演义序》），拥有信史的功能与荣誉，又不丢弃民间叙述的活泼与精彩？这就需要小说作者极力弥合史官叙述与民间叙述的巨大裂缝，使在民间叙述中已被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人物定位与思想逻辑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中仍能继续成立，否则情节设计与形象塑造的合理性便会遭到质疑。

以关羽连杀袁绍两员大将颜良、文丑的故事为例：《三国志平话》对这一故事的叙述，可以完全不受官渡之战历史情境的束缚；然而到了《三国志演义》那里，情形便迥然不同。小说作者已将这场战役设为刘备集团活动的重要舞台，故而需要保全关羽在这一特定情境中的忠义形象。然而，关羽的斩杀袁将，如前所析，对君主汉献帝与盟友袁绍，可谓构成了双重背叛。此外，刘备兵败逃至袁绍处寻求庇护，项羽的举动其实对刘备的安危也构成了威胁，袁绍有可能因痛失爱将而迁怒刘备。那么小说该如何为关羽开脱呢？其途径大致有三：

一是渲染关羽对汉献帝的忠心。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关羽再三辞却曹操授予他的“寿亭侯印”。后来曹操悟出缘由，“遂教销印匠销去字，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关羽）遂拜受之。”^⑫小说家笔下关羽的这一矫情之举，可以看成是对其悖逆行径的一种笨拙的遮掩。^⑬二是将袁绍写成昏庸之辈，这样不但关羽对袁绍一方的反戈一击，可以理解成袁绍的咎由自取；而且后来刘备背信弃义地离开袁绍而转投刘表，也被解释成是袁绍无能无德、“二次欲杀皇叔”所致^⑭。三是把关羽的上阵，说成是曹操设下的一个圈套。曹操原本担心关羽上阵立功后，便有了离开曹营



的理由,开始不同意派关羽去跟颜良对决。谋士程昱劝道:“刘备若在,必投袁绍。今若使云长破袁绍之兵,绍必疑刘备而杀之矣。备既死,云长又安往乎?”(《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五回)此乃一石二鸟、借刀杀人之计。曹操闻之“大喜”,立刻采纳。四是声明关羽不知刘备已投奔袁绍。他在降曹时所约“三事”之一便是“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即使先后与颜良、文丑对阵,也仍然不知刘备的去向。实际上,小说已明明交待袁绍得知刘备不敌曹操时虽未派兵援救,却曾承诺道:“倘有不如意,可来相投,吾自有相助之处。”(同上第二十四回)还写刘备亡归袁绍后,与大将文丑一同率军与曹操交锋。当时身在曹营的关羽,既能上阵斩杀文丑,便知他对袁绍的排兵布阵了然于胸,岂能对刘备的下落一无所知呢?小说担心读者产生质疑,便在第二十六回虚构了如下笔墨:

(袁)绍喜,唤文丑与玄德同领前部。文丑曰:“刘玄德屡败之将,于军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时,某分三万军,教他为后部。”于是文丑自领七万军先行,令玄德引三万军随后。

好像刘备统领后部兵马,关羽便不知他身在何处了。这种写法岂能令人信服?毛宗岗在修订《三国志演义》时,也意识到关羽斩杀袁绍二将的行为,可能会损害他的高大形象,于是在第二十五回之前的回评中曲为辩解道:

“刘备既在袁绍处,则袁之将,即刘之将也。关公而杀袁之将,是即杀刘之将也。使绍因颜良之死而杀玄德,与关公杀之何异?然此不得为关公咎也。绍之约备,虽有‘倘不如意,当来相投’之语,而第一次致书,发兵而不战;第二次致书,并兵亦不发。关公此时安知备之必投绍,绍之必纳备乎?曹操军中细作料已探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难蒙蔽关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关公曰:‘我当立功报曹而后去。’则其杀袁将者,正谓归刘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绝其归刘之路;关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归刘之心。故曰:不得为关公咎也。”

此地无银三百两。毛氏极力为关羽打掩护,不料反而凸显了其行为的破绽。这一苍白无力的狡辩,颇能提醒人们关注这部小说如何为疏通人物的行为逻辑而拾遗补缺。

在小说的官渡之战部分,刘备集团的故事大多源自讲史、戏曲等民间素材,而袁、曹集团的内容则主要取材于《三国志》等史书,其叙述文体可称为“准纪

事本末体”^⑮,内容基本上是对史料的拼贴与敷衍,创造发挥不足,生动活泼不够,导致小说可读性的下降。这是身为官渡之战主角的曹操与袁绍未能在小说的这一部分夺人耳目的主因所在。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准纪事本末体”具有“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文体特点,在这一叙事逻辑推动下,作品需要揭示官渡之战的胜败之理,致力提供历史借鉴,从而超越了民间叙述十分强大的一味贬曹的思维定式,使曹操形象得以避免平面与单薄。比如小说第三十一回写袁绍不甘失败,“再整人马,来战曹操”。河北民众厌弃袁绍,欢迎曹操,出现了如下情景:

时操引得胜之兵,陈列于河上,有士人箪食壶浆以迎之。操见父老数人须发尽白,乃命入帐中赐坐,问之曰:“老丈多少年纪?”答曰:“皆近百岁矣。”操曰:“吾军士惊扰汝乡,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宿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当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绢帛赐老人而遣之。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

又如第三十三回,写曹操率兵追剿袁谭时的一幕:

曹操追至南皮,时天气肃寒,河道尽冻,粮船不能行动。操令本处百姓敲兵拽船。百姓闻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斩之。百姓闻得,乃亲往营中投首。操曰:“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匿,休被我军士擒获。”百姓皆垂泪而去。

上引两段发掘曹操善德的文字,均源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揭示了曹操战胜袁绍的必然:“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第一段引文在此基础上,借老丈人之口,进一步指出曹操胜利的另外一大原因在于他能爱民安众,而袁绍则失去民心,“重敛于民,民皆怨之。”第二段引文较之《三国志》,能明确点出曹操亦有“不忍”之心与仁厚之处。《三国志》记述逃亡百姓“后竟捕得”,此四字揭示出百姓的凄惨命运,若小说据此加以表述,则会影响对曹操善行的揄扬,故而未加采录。两段文字均借鉴了史



传著作“于序事中寓论断”^⑨的表达方式，揭示了曹操胜利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如若没有自觉探寻“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的史官意识，很难想象上述文字会出现于小说之中。民间叙述中的曹操色彩较为单一，是个十足的白脸奸臣；小说中的曹操却善恶杂陈，色彩斑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内蕴最为深厚的圆形人物之一。而这与小说追慕史官叙述，显然有着直接关联。

注释：

- ① 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 ② 方诗铭：《方诗铭论三国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 ③ 宋培宪：《官渡、赤壁、夷陵之战综论》，收录于沈伯俊等主编的《三国演义学刊2004》，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353页。
- ④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 ⑤ 本文对《三国志演义》的引文，若无另外注明，均出自刘世德、郑铭点校的毛本《三国志演义》，中华书局，1998年版。
- ⑥ 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 ⑦ 参读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概论》（上）第三编第一章第一节“汉末割据形势和官渡之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以及《中国军事通史》第七卷《三国军事史》第四章第一节“官渡之战”（上）、第二节“官渡之战”（下）。
- ⑧ 张志和：《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⑨ 浦安迪未能联系小说中袁、刘联盟的背景去分析关羽斩杀颜良的行为。参读《中国叙事学》第152页。

⑩ 转引自《胡适文存·一集》卷一，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5页。

⑪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⑫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页。

⑬ 嘉靖本的这段文字被毛本删去。毛宗岗在小说第二十六回的回评指出：“夫汉寿，地名也；亭侯，爵名也。”“（关羽）加以‘汉’字而后受，是齐东野人之语。”

⑭ 《三国志演义》在第二十七回通过孙乾之口，写刘备之所以离开袁绍转投刘表。孙乾对关羽说：“……袁绍多疑，主持不定。某与皇叔商议，先求脱身之计。”又对刘备夫人说：“袁绍二次欲斩皇叔，今幸脱身……”

⑮ 陈文新指出《三国演义》的文体大致有“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三种。小说对官渡决战的记述，可归为“准纪事本末体”。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回避心理描写，人物语言富有理性，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参读陈文新的《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第238—24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⑯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盛赞《史记》能“于序事中寓论断”。此法其实常见于古代史传著作，并不为《史记》所独擅。

（作者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史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迎丰 卢雁

简讯：

本刊获评“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 “军旅文艺”栏目获评“特色栏目”

为展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启动以来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所取得的成绩，推动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断提升办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同意，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于2010年4月至7月开展了第四届全国高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并于2010年10月末正式公布了评优结果。其中，《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获评“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军旅文艺”栏目获评“特色栏目”。

在此感谢各级领导、各方同行、广大作者和读者多年来对本刊的帮助与支持。

本刊编辑部